

说起厕所,先讲一个小故事。那是去年秋天,我们到欧洲旅游,一天下午,我们在饱览了德国马克斯堡附近的一个古镇的风光后已近黄昏,这时不少人都想去方便一下。谁知厕所难觅,好不容易在导游的带领下,在镇边找到一个公共厕所,大家蜂拥而上,却被一个管理员拦着要收费,每位1欧元。尽管导游早就告诉过大家,这里有些公共厕所要收费。但乍一碰上,确实让有些游人不适应。其中就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很不以为然,嘴里哼了一声,说:“上个厕所要收1欧元,相当于8元人民币了。大贵了!我不上了。我憋着!”说完,扭头走了。谁知,他在回宾馆的路上实在憋不住了。只见他抓耳挠腮,面孔憋得通红。我们见状赶忙请司机将车子开到就近一个公共厕所门口停下,然后陪他快速跑进去,帮他付了一欧元,才解了这位仁兄的“一洩”之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如厕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则更严重。有人统计过,“全世

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干净卫生的厕所”使用,这给人类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2013年7月联合国大会专门作出决定,以每年11月19日作为“世界厕所日”,以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厕所问题的重视。

回顾上海解决厕所问题,也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埠之前,上海没有公共厕所,人们在田边林间或向路边粪缸随意“方便”,不但不会要钱,而且人家还会感谢你,因为可以肥田。

直到上海开埠之后,事情才起了变化。1843年,上海人口只有23万;十年后,猛涨到54万多。1880年已超百万。然而,公共厕所建设却没有跟上。弄得许多城里城外的人四处询问:“哪里有厕所?”实在不行了,就在人家墙根下、小弄堂等处“随意方便”,一旦被巡捕抓住,起码罚三角钱,最多罚到2元银洋。当时的2元银钱可买几十斤大米。这个代价远比不上今天的1欧元大多了。

詹姆斯·乔伊斯曾说过:“人

类的文明走到哪里,厕所就跟到哪里。”这里说的文明主要是指城市文明。当年的租界当局在上海人口猛涨、城市发展迅速的情况下,未能未雨绸缪,而是被动应付。他们通过征地建造了一些厕所,但远远不能满足,比如有一间紧靠大马路的厕所,每天都排着长队,每小时最多接待300多人。而上海老城厢里,也同样为人多厕所所困。如厕难成了上海一个长期的“老大难”问题。

要解决这个难题,就不能将厕所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城市摆设,而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设施,同时它还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周谷城先生在参加《东方杂志》《梦想中国》征文时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方便。”

当然,要实现周谷老的这个梦想,是需要相当的财力,但更需要城市主事者主动积极的“顶层

设计”,而决不可被动应付。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住房得到改善,相当多的人用上了抽水马桶,原先一百多万只马桶基本消失。在城市改造中,注意在公园、绿地、广场、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建造公共厕所,不仅使用方便,而且无异味,更让人高兴的是,还增设了残疾人的厕位和照顾母婴、儿童,以及部分特殊人群的第三卫生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上海为了开好长达半年之久的世博会,对公厕作了十分精细的安排,不仅在世博园4.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造了9000个厕位,还准备了几百个移动厕所,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了上海世博会顺利进行。

当然,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厕所问题在中国,包括在上海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这就更加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在城市建设中,将厕所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我觉得詹姆斯·乔伊斯的那句话是否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厕所建到哪里,人类文明就走到哪里!

讲起黄鱼,老上海都懂,黄鱼就是味道入骨鲜的海鱼,黄鱼也是“黄货”,也就是黄澄澄亮晃晃的黄金,就是一条一条的金条。金条有大有小,大小金条被上海人称作大黄鱼、小黄鱼,“黄鱼”以其成色足实,随时随地可以兑换钞票而广受热捧。作为海产的黄鱼还以其独具的色泽光亮、黄灿灿的富贵形象,拥有金贵吉祥、年年有余的好口彩。一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头的一两年,上海人宁可在寒风里冻得嗦嗦抖,也要热情奔涌地隔夜在小菜场排队买黄鱼,因为黄鱼又叫黄金龙、大王鱼,年夜饭的台面上让一家门有得黄鱼可以看,年三十勿吃光余下来再有得吃,不光是有台型,也是有福气——现实当中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对将来的望头,也要在眼前看得着彩头,明黄金壳的黄鱼,由此而越发受人欢喜。

人的习俗难以改换。但是,人的有些生活方式随着工业化、随着现代化而渐渐摩登起来,人们在享受高效、便捷的现代福果的同时,也因生产及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使得空气、土壤和水体等大自然的本身特质和风貌受损,改变了自然生物的生存环境,以至于迫使运行了无以计数的年份的自然规律有时候变得抖抖颤颤而品尝到了苦果。海洋水体的变化,使得黄鱼的生存和繁衍大受影响,渔民出海越来越难捕到大黄鱼,连黄鱼也越来越少了。还好,水产专家有了科研成果,菜场和超市出现了冰鲜黄鱼,这就是人工养殖的黄鱼。

然而,比起海洋里野生的黄鱼来,养殖的黄鱼肉质散嫩而纤维松散,再也没有老早黄鱼的嫩而紧结、鲜而耐品的原味了;养殖的黄鱼有金色而不鲜亮,再也没有老早黄鱼的金光澄亮的原色了。

好就好在人是会动脑筋的。一方面,海上、岸上联手保护海洋环境,严格实行休渔制度,让黄鱼好好休养生息;另一方面,有画家灵感涌动,用画笔来创作历史上少有画作可查的黄鱼,为人们留存吉祥而充满朝气的文化记忆。宁波的李采娇就是用画黄鱼来唤起乡愁、用画作长久留传黄鱼所蕴含的金华辉灿、吉祥意蕴的一位富有创造力的画家。她笔下的黄鱼:形体饱满而情态奋勇、细节无遗而特质毕现,藤黄如金而浓淡有致、潜游有力而意趣无尽。如果说,适度捕获而膳用无穷、代代繁兴的黄鱼是人的一种文化行为的话,那么,很少在画纸上出现的黄鱼,则是人类尊重自然的欢喜心所遣使的艺术创造。黄鱼画,在传统的富贵吉祥的美意之外,还给我们带来了见证和讴歌时代的诚意,宣传和提倡保护海洋环境的善意。

黄鱼呈祥

——景观微言
任向阳

如今这鸟儿胆子也忒大了,当我慢慢踱到距它不到一米的距离时,它并没有“扑腾扑腾”展翅高飞,照旧气定神闲地在草丛里辛勤地觅食,全然不知人类向它走近有可能带来N种无法预知的假设。我不禁感慨,如今的鸟啊,也许在祥和的环境下生活得太久了,似乎风险意识早就置之一旁,真是笨拙得可爱!比起它们的先辈,如今的鸟儿真是“生在蜜糖中,长在花园里”……

橡皮弹弓,子弹是用带有油性的河泥制成的圆球;还有一种就是极具杀伤力的气枪。我有一个邻居叫阿四,其模样和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卡西摩多差不多,右眼还是斜视,但在艰苦的生活状态下,为了增加点营养,他从小就玩弹弓,久而久之,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本领,闻名遐迩,他只要斜眼一闭,弹弓一拉,指哪打哪,停在树上栖息或在飞翔的鸟儿无一幸免。每次狩猎,总是满载而归。后来,阿四的装备有了升级版,高压气枪替代了弹弓,那可真是如虎添翼,被阿四射杀的鸟儿更是不计其数。特定的时代造就特定的人。由于阿四功勋卓著,在麻雀列为“四害”的年代,阿四的特长得以发挥,被街道评定为“首席猎手”。他带领一个小组,用气枪、弹弓捕杀犯有“与人类为敌罪”的麻雀,因为战功赫赫,街道奖励阿四十盒气枪子弹……那时的阿四,是个风云人物啊!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鸟儿们,尤其是被围剿的麻雀,数量急剧下降,看见人类总是躲得远远的,你倘若做一个举手的动作,它们立马四散逃逸。它们实在是被打怕了,在它们的眼睛里,人类或许就是扼夺它们生命的“冷血杀手”,不得不时时提高警惕哦!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也许正是这些小生灵的梦想吧!

如今,那些没有历经过“腥风血雨”的子孙,自由自在地翱翔在蓝天白云间嬉戏打闹,在祥和友善

的环境中悠然地觅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中接受着人类的爱抚、大自然的馈赠。在它们的世界里,人类似乎和他们是“一伙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

而那位曾经的“风云人物”——阿四,晚年致力于鸟儿的保护,成了一名鸟类保护志愿者,那支曾猎杀鸟儿的汽枪早已主动上交。他常反省自己当年的鲁莽与残忍:在他的床头放着一尊麻雀的雕塑。他说,我要忏悔啊!时势造英雄,不能怪他噢!

笨拙的鸟儿,展翅飞翔吧,我们可是你友善的伙伴噢!

阿弟检索到,现在出海捕鱼,捕获黄鱼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就在2017年3月、9月,浙江普陀、奉化的渔民先后捕到2.66公斤和4.9公斤的野生大黄鱼。普陀东极镇渔民黄再良说他捕鱼30多年才见到这么大的黄鱼。类似的消息近几年常常见诸媒体,不光渔民惊喜,更有许多人高兴。超市里也常年摆放野生黄鱼。

阿弟觉得这是非常好非非常好的喜讯,这真如画家所言,黄鱼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弟推论,黄鱼繁兴,这是海洋环境在逐渐变好啊,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吉祥啊!阿弟用手机拍下了这幅黄鱼画,立即发到了朋友圈里。

笨拙的鸟儿

胡海明



冰雪初融

(摄影)

沈丹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图书行业工作,恋人在服装行业工作。也许是各自职业使然,我们跟随对方的脚步走进布店或书店,显得十分自然:她选好的布料给我做新衣,让我的仪表更上一层楼;而她踏进书店,我有时会选一本世界名著,低声背诵里面富有人生哲理的片段,与意中人分享。

我们光顾最多的是南京路商业街和福州路文化街上的各家布店与书店。

说起上海的布店和书店,还是很有点来头的。

上海开埠后,大量洋布涌入,宁波人盯住最赚钱的洋布,争夺老城厢外的棋盘街,在今河南路、福州路一带开店卖布。于是,这里成了上海布店的发祥地。1912年,宁波人柴宝怀、丁丕山集资,创设“协大祥”,开创了现代布店成立公司的先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纺织工业得到发展,“协大祥”之后,“宝大祥”和“信大祥”又孕育而生。

民国时期的“三大祥”自行设计花型、规格,还向纺织厂投资,并定织、定染,以操纵经营权。他们备货充足,花色齐全,加上各种营销手段,控制了上海棉布零售业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大祥”经公私合营,继续发挥作用。

同布店一样,新式书店也在上海开埠后风行起来,洋人来沪开创了墨海书馆,接着,外省市人来到棋盘街开书店。清末兴起教育改革,办学堂需教科书,故当时的书店大多以销售教科书为主。

1948年,在上海书商同业公会登记在册的书店有604家。1950年,本市有关部门把书店、书摊等归并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还将商务、中华、开明、联营书店等发行机构合并成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6年,上海图书发行业主管部门对从事新、旧、古书的约一百三十家店进行公私合营;1958年,再把书画收藏、古旧书店进行分工,新书合并到新华书店,外文归到外文书店,古旧书先后改为上海古旧书店、上海书店和上海图书有限公司。

我们这对恋人自走进彼此工作相关的布店与书店起,到了解乃至喜欢上对方的职业,爱屋及乌,以至于情投意合、结婚生子。数十年后,轮到儿子恋爱、结婚,他们走过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却没有父母那种情怀和感觉了,因为难见布店踪影,习惯于穿现成的衣服;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网上购书也普及起来,书店转型,以卖咖啡、文具、文创产品等副业来支撑主业。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啊!

文文姐妹是我们家的邻居,年纪与我们兄弟俩相仿,大人们又是同事加朋友,两家关系挺好的。

老是听文文妈妈说,文文两姐妹很乖,很懂事,但就是胃口不好,吃饭不香,挑食的坏毛病日趋严重,好吃好喝地侍候着,可还是不见起色。我们兄弟俩都十分奇怪,难道文文家里天天大鱼大肉吃厌了不成?

终于有一天,文文姐妹要来搭伙吃饭了,她们的爸爸妈妈有事要出远门几天,就把这对宝贝女儿送来我们家里,家里多了两位小姐妹,一下子就热闹多了。

通常,我们家吃晚饭,一张方桌一人一边,现在文文姐妹来了,她们姐妹一边,我们兄弟一边,爸爸妈妈仍是面对面坐。饭还是一样的米饭,菜也还是一样的家常小菜,依旧是丰盛盛菜,大碗盛汤,唯一有点变化的是盛菜的盘子似乎更靠近了文文姐妹,不像过去,绝对会放在我与弟弟的中间!对于我们哥俩,文文姐妹是客人,应该更关心照顾,菜盘子放得偏向她们俩绝对没有问题。嘴上是这样说,可是真正开始吃饭了的时候,我们两兄弟就原形毕露了,身不由己呀!

平时,一荤一素一汤是晚餐的基本配置,偶尔也会加

一两个素菜,若是有额外的荤菜端上桌来,那一定是有个客人来了。文文姐妹虽不是什么大客人,但妈妈还是会多烧一个菜,可是,吃饭时这对娇妹妹还是吃得少少的,这也不要吃那也不想吃的,而我们哥俩依旧是狼吞虎咽,尽显“英雄本色”。

第一天晚餐,可怜的文文姐妹还在“娇滴滴”、“嗲兮兮”地酝酿吃饭的情绪,转眼间盛荤菜的盘子已见底,若不是妈妈大声训斥着:注意吃相!这荤菜盘子必定是第一个被消灭干净的。接下去,素菜也被大家合力攻击,难逃全军覆没的下场。

第一天,第二天,两天的耳闻目睹,文文姐妹一定是大开眼界,亲身经历了“吃饭大战”,体会了“白汤”就“白饭”的无奈,她们也学着“战斗”了,没有人劝她们多吃,快吃,饭桌上的竞争场面早已感染着她们。从第三天开始,文文姐妹就和我们哥俩一样,像小狼一样开始抢食,一切都是如此自然,根本没有慢慢的过渡和说教!

接下去,妈妈为难了,家里四只嗷嗷叫的“小饿狼”,再多的粗茶淡饭也经不住如此争抢,我们家的饭桌上便开始了“公菜、私菜”的分配

制。公菜就是素菜呀,汤呀,一大盘一大碗可以与大家分享,相对不受量的限制,放在饭桌的中间“尽吃”(尽情地吃)。私菜是属于自己的,老少无欺,妈妈爸爸也是人手一份,往往是比较珍贵的荤菜,分配的过程也是公开透明,现场操作。这样一来,小小的饭桌上更加丰盛,大碗大盘小碗小碟满满当当的更加热闹,我们小哥俩也是开心满足,“私菜”不用急着吃,“公菜”更是一样地“尽吃”。文文姐妹几天下来完全变了一个样,一样地大口吃饭,大筷夹菜,不输我们哥俩,吃饭时真的是那个热闹,谁看了都想一起吃!

后来,文文妈妈说她们两个宝贝姑娘这些日子养得太好了,脸也圆了,精神也好了,回家吃东西更是看不懂,居然会抢会争了,不知道妈妈是如何教育的?

好景不长,几周以后,文文妈妈就又犯愁了:她的宝贝女儿又茶饭不香,旧习难改。好几次,她开玩笑说,要长期把文文姐妹送来搭伙。

若干年后,又见到了文文姐妹,她们还是那样秀气文静,一吃饭饭时还是那样“顾虑重重”,说是怕这怕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都不好意思大声说她们:矫情!不过,文文姐妹都说:你们家妈妈做的晚饭真好吃!和你们一起吃饭真有力!现在再也没有那样的欢乐时光了!

七夕会

养

育